

族群關係與孫吳政權的成立

呂春盛^{*}

摘要

孫吳政權由富春豪強孫堅發跡，孫堅子孫策創建，再由孫策弟孫權確立。孫吳為六朝政權之首，魏晉南北朝南方政權之始，其特殊的歷史地位，不言可喻。

學界關於孫吳政權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孫吳政權的性格，以及孫吳政權內部各派系的權力關係，鮮少從族群關係演變的角度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本文即試圖沿著孫氏勢力在江南的發展歷程，分析孫氏建國的基本武力，考察當時江南各族群勢力的關係演變，由此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或許對原本地方根基薄弱的孫氏，如何能夠在江南立國，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孫吳政權以淮泗集團為核心，其立足江東，難免要與江南各種勢力展開結盟或敵對關係，其中山越土著敵對態勢最為強烈，又常被外部勢力策動，充當內應，因而始終與孫吳政權處在敵對的狀態。江東大族起初也是站在孫吳政權的對立面，但為自身生存與家族發展，不得不由敵對、旁視而妥協，況且在族類歸屬上，相對於帶有濃厚異族色彩的山越，江北淮泗士人與江東大族同受儒學，文化傳統上同聲共氣，而江東大族與山越土著之間，長期在地方上有利害關係之矛盾衝突，在種種因素的加乘之下，以淮泗集團為核心的孫吳政權，乃採取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土著的策略，孫吳政權依此擴大其基層統治，並補充兵源與戶口，所謂「彊者為兵，羸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者補戶」，而江東大族也因討伐山越，更加穩固其地方的實力與利益，遷官封侯，甚至逐漸進入權力核心，這種以淮泗集團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的族群政治格局，終孫權之世未有重大的變動。

關鍵詞：孫吳政權、淮泗集團、江東大族、山越、族群關係

一、前言

東漢末年黃巾動亂，揚州吳郡富春縣的豪強孫堅（157-193）率眾北上參與討伐黃巾，立功位至長沙太守、領豫州刺史，後來戰死沙場。孫堅死後，其子孫策（175-200）募眾從揚州牧袁術（155-199），求得孫堅遺部，興平二年（195）攻占江東六郡，可視為孫吳政權之始。建安五年（200），孫策被刺殺，其弟孫權（182-252）繼統江東。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戰，孫權聯合劉備（161-223）打敗曹操（155-220）大軍，政權漸趨穩固，但再過二十年，黃龍元年（229），孫權才正式稱帝。

孫吳為六朝政權之首，魏晉南北朝南方政權之始，其特殊的歷史地位，不言可喻。學界關於孫吳政權的研究，主要聚焦於孫吳政權的性格，以及孫吳政權內部各派系的權力關係。

關於孫吳政權的性格，唐長孺認為，東漢末年南北都普遍存在以宗族、鄉里為核心的武裝組織，在南方特稱之為宗部，孫吳的建國乃是以孫氏為首的若干宗族對於另外各個宗族集團（即宗部）的勝利；¹川勝義雄認為，東漢末的江南是較後進的開發社會，有龐大的山越土著勢力，孫吳政權是帶有「開發領主制」傾向的軍事政權，孫吳的建國，即「開發領主制」在江南的落實；²大川富士夫認為，江南地域由於有山越與土豪的存在，孫吳的建國不得不依賴江北與江南的豪族與士大夫階層，形成存有儒家理念的軍國政權。³以上各篇，都強調當時江南社會的特殊性與孫吳政權性格的關係。

關於孫吳政權內部各派系的權力關係，王霜媚認為，從孫策

¹ 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3-29。

²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會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第II部第二章，〈孫吳政權と江南の開發領主制〉，頁143-170。該書由徐谷芄、李濟滄中譯為《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³ 大川富士夫，《六朝江南の豪族社會》（東京：雄山閣，1987），第三篇第一章，〈孫吳政權の成立をめぐる〉，頁203-236。

軍政府時期到孫權民政府時期，孫吳政權的權力核心，由江淮系人士轉到江南名族，並以此說明江南名族發展成為貴族的緣由；⁴方北辰由江東世家大族在政局扮演的角色，論述孫吳政權的興亡；⁵田餘慶亦從孫吳政權江東化，即江東豪族逐漸成為權力核心的過程，來論述孫吳政權的成立與鞏固；⁶高敏則從孫吳建國過程中北方地主集團與江東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鬥爭，說明三國之中孫吳政權最晚稱帝獨立的原因。⁷以上各篇，基本上都傾向孫吳政權的權力核心有所謂江東化的現象。王永平承襲孫吳政權江東化之說，但又多留意從皇權運作與政治觀念異同的角度，論述孫吳政權各派系的起伏關係。⁸然而在此議題上，黃熾霖則持異說，他運用計量方法，從中央文武官員的地域分布及政治派系，認為淮泗集團在文武官員之中始終占有相當重要的比率，從而質疑有所謂孫吳政權江東化之說。⁹

另外，關於孫吳政權的成立與發展過程，早年已有宮川尚志在許多細節上的研究，¹⁰近年石井仁又特別從孫策與孫權拜授官位的遷轉，說明孫吳從雄據地方到建立政權，如何取得其統治的合法性，並進一步有一統天下的野心；¹¹渡邊義浩則從非名士出身的

⁴ 王霜媚，〈孫吳政權的成立與南北勢力的興替〉，《食貨月刊（復刊）》，10：3（臺北，1980.6），頁71-81。

⁵ 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上篇第二章，〈孫吳時期江東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動〉，頁19-58。

⁶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收入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華書局，2004.2），頁262-295。（原載於《歷史研究》，1992：1〔北京，1992.2〕，頁70-89。）

⁷ 高敏，〈試論孫吳建國過程中北方地主集團與江東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鬥爭〉，《鄭州大學學報》，1994：1（鄭州，1994.2），頁22-27。

⁸ 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⁹ 黃熾霖，《從中央文官之地域分佈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臺北：天空數位圖書公司，2012）；黃熾霖，《從中央武官之地域分佈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臺北：天空數位圖書公司，2015）。

¹⁰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64），第三章第三節，〈三國吳的政治と制度〉，頁233-261。

¹¹ 石井仁，〈孫吳政權の成立をめぐる諸問題〉，《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6（仙台，1995.1），頁70-94。

孫氏，如何取得北來名士與江東人士的支持，論述孫吳君主由匡輔漢室到自立政權的過程。¹²此外，尚有顧江龍以孫吳的建國歷程為碩士學位論文，¹³都很有參考價值。

以上學界對於孫吳政權成立的種種相關議題，可說已有相當豐富的成果，然而稍感不足的是，對於江南土著勢力山越的角色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孫策攻佔江東，幾乎遭受到江東各種勢力的反抗，後來大多數勢力不得不與孫吳政權合作，唯獨山越土著勢力，始終維持著敵對狀態。關於山越，唐長孺認為大多數是逃亡山區的漢人，與一般人民沒有差別，¹⁴此說雖值得商榷，¹⁵但他認為山越領袖與漢人宗部勢力關係密切，山越組織幾乎亦與宗部成為一體，¹⁶則頗有參考的價值。傅樂成、高亞偉、陳連慶把史書所載之「山中名帥」，大致皆視為山越酋豪，¹⁷許倬雲則認為這些「山中名帥」，只是地方上的大姓，絕非山越酋豪。¹⁸誠然，就字義上「山民」與「山越」並非全等，「宗帥」、「名帥」也未必是山

¹² 渡邊義浩，〈孫吳政權の形成〉，《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38（東京，1999.3），頁81-115。該文後來收入渡邊義浩，《三國政權の構造と「名士」》（東京：汲古書院，2004），第三章第一節，頁217-248。

¹³ 顧江龍，〈孫吳建國歷程新探〉（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

¹⁴ 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7-14。早在唐長孺之前，呂思勉、井上晁也都有類似的說法，參見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乙帙，〈秦漢·山越〉條，頁582；井上晁，〈三國時代の山越に就て〉，《史觀》，17（東京，1938.10），頁57-68。

¹⁵ 筆者認為山越仍是非漢族之土著民，基本上與一般漢人不同，參見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3（臺北，2005.6），頁3-16。

¹⁶ 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7-14。

¹⁷ 傅樂成，〈孫吳與山越之開發〉，收入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9），頁81-91。（原載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3〔臺北，1951.12〕，頁119-128。）；高亞偉，〈孫吳開闢蠻越考（上）〉，《大陸雜誌》7：7（臺北，1953.10），頁13-18；高亞偉，〈孫吳開闢蠻越考（下）〉，《大陸雜誌》，7：8（臺北，1953.10），頁12-18；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山越〉，頁234-242。

¹⁸ 許倬雲，〈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收入許倬雲，《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561-585。（原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上〔臺北，1967.3〕，頁185-200。）

越酋豪，¹⁹然而要考察史書所載之「宗帥」、「名帥」究竟只是漢族之地方豪強，或可能是山越酋豪，則並不容易。衡諸當時政情發展中各股勢力之間的關係，由於山越酋豪與宗部領袖常被連用在一起，彼此亦經常聯合行動，不妨視兩者為同一股勢力。總之，山越作為當時江南的土著勢力，不可輕忽其在孫吳建國中的角色，若從當時江南各族群的關係演變，來探討孫吳政權的成立問題，或許對原本地方根基薄弱的孫氏，如何能夠在江南立國，會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最後，對本文所謂的族群稍做說明。「族群」一詞的定義，眾說紛紜，無法在此細論。²⁰筆者認為，由於受到史料的制約，歷史研究上不妨採取較寬鬆的界定，如王明珂即把歷史上各種不同層次的人群認同單位皆可稱之為族群，²¹又如王甫昌界定族群為介於地域團體與民族之間的社會認同單位。²²蓋人群之分類本來就是棘手的難題，從實用的觀點來看，一種分類是否恰當，端視其能否有效掌握該時代的歷史特色。²³前人在研究孫吳建國過程中屢屢提及的所謂淮泗集團、江東大族、山越宗帥等等勢力，既難以稱之為民族，亦非只是單純的地域集團，筆者認為不妨以族群視之，淮泗集團概指當時出身於淮河、泗水流域的江北人物，江東大族則指江東地區（又稱江左、江南）的世家大族，²⁴山越宗帥指江東

¹⁹ 胡守為、施光明皆強調山越與宗部之不同，但難於否認在當時對抗形勢中，兩者常聯合在一起。參見胡守為，〈山越與宗部〉，收入《學術研究》編輯部編，《史學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頁1-17；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1（北京，1984.1），頁66-69。

²⁰ 關於族群定義之爭議，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7），第一章，〈當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頁24之註1。

²¹ 此處筆者較認同王明珂對族群的定義，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一章，〈當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頁24之註1。

²²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3），第二章，〈什麼是「族群」與「族群認同」？〉，頁9-18。

²³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第一章，〈導論〉，頁10-11。

²⁴ 關於淮泗集團、江東大族之界定，本文大致沿用學界常用的概念，相關討論參見黃熾霖，《從中央文官之地域分布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頁14-22。

大族之外包括原住民在內的江南土豪勢力，在行文中有時簡稱山越。本文即試圖沿著孫氏勢力在江南的發展歷程，分析孫氏建國的基本武力，考察當時江南各族群勢力的關係演變，由此掌握孫吳政權的成立關鍵。

二、孫堅的發跡及其基本武力

（一）孫堅的發跡

孫吳政權的發跡人孫堅，吳郡富春人，《三國志》作者陳壽（233-297）說他「勇摯剛毅，孤微發跡」，²⁵但他少為縣吏，又歷任鹽瀆、盱眙、下邳三縣丞，可見亦非一般市井小民，應屬地方豪強之類，但絕非當時的名士階層，殆無疑慮。²⁶中平元年（184）黃巾亂起，孫堅受命率領鄉里少年，「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²⁷發兵討平汝、潁地區的黃巾，拜別部司馬。中平三年（186）又以長沙太守，討平區星變亂，封烏程侯，勢力日漸坐大。

靈帝崩（189），董卓（138-192）擅朝政，關東諸州郡以袁紹（154-202）為盟主起兵討伐董卓，孫堅亦舉兵，但兵鋒卻指向同陣營的荊州刺史王叡（?-189），以其曾對己無禮而殺之。至此時，孫堅已擁眾數萬人，隨後又斬殺南陽太守張咨（?-190），試圖雄據荊州。王叡、張咨皆為當時名士，孫堅所為難容於當時勢力最大的盟主袁紹，為了自保並取得經濟後援，孫堅乃與袁術結盟而退出南陽，袁術上表以孫堅為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治兵於魯陽

²⁵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46，〈吳書·孫堅傳〉之〈評曰〉，頁1112。本文所引正史及《資治通鑑》皆為新校本，若用其他版本將另行注明。

²⁶ 關於孫堅之出身，論者已多，參見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第三章第三節，〈三國吳の政治と制度〉，頁233-235；方詩銘，〈孫堅軍事力量的形成壯大及其爭奪荊豫兩州的戰爭〉，收入《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181；渡邊義浩，〈孫吳政權の形成〉，頁83-85；王永平，〈論孫權父子之「輕脫」〉，收入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1-6。

²⁷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堅傳〉，頁1094。

城，形成袁術—公孫瓚（?-199）—孫堅聯合，對抗袁紹—劉表—曹操的局面。²⁸孫堅在討伐董卓作戰中，大敗董卓軍，斬殺其都督華雄（?-191），董卓憚其猛壯，曾遣將軍李傕（?-198）求和親被拒。董卓焚燒洛陽徙都長安，孫堅乃入洛陽修帝陵，再引軍返屯魯陽。初平三年（192），袁術使孫堅攻打荊州刺史劉表（142-208）；次年（193）孫堅被劉表的部下黃祖（?-208）的軍士所射殺，時年 37 歲。

（二）孫堅的軍隊組成

孫堅既是地方豪強出身，在鄉里社會有其一定的宗親勢力，²⁹他年少任縣吏時，曾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千餘人，³⁰與州郡兵合討會稽民變；任三縣丞時，「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³¹及至孫堅舉兵，其季弟孫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³²可見其基本隊伍當有部分來自地方鄉里宗親的勢力。然而，舉兵北上之後，其隊伍迅速擴張，兵源則多從各地招募而來，如初討黃巾時，「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³³而討平長沙區星等「山賊」之後，更在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擴充兵源及財富，其武裝力量更加壯大。³⁴及至殺王叡之後，已有眾數萬人。當時招募之軍隊，大多由當地人士率領，因此由孫堅隨從將領之出身，亦可略知其軍隊之組成。據渡邊義浩的研究，《三國志》列傳所見孫堅的元從舊臣有呂範（?-228，豫州汝南細陽人）、黃蓋（145-222，荊州零陵泉陵人）、朱治（156-224，揚州丹楊故鄣人）、芮祉（揚州丹楊人）、孫河（?-204，揚州吳郡吳人）、徐琨（揚州吳郡富春人）、吳景（?-203，揚州吳郡人）、程普（幽州

²⁸ 渡邊義浩，〈孫吳政權の形成〉，頁88-89。

²⁹ 張曉東，〈孫吳政權創建時期的孫氏族人〉，《湖北社會科學》，2007：12（武漢，2007.12），頁114。

³⁰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堅傳〉，頁1093。

³¹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堅傳〉，注引《江表傳》，頁1094。

³² 晉·陳壽，《三國志》，卷51，〈吳書·孫靜傳〉，頁1205。

³³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堅傳〉，頁1094。

³⁴ 方詩銘，〈孫堅軍事力量的形成壯大及其爭奪荊豫兩州的戰爭〉，頁183。

右北平土垠人)、韓當(?-226, 幽州遼西令史人), 其中朱治、芮祉、孫河、徐琨、吳景為孫氏宗親或鄉里人物, 呂範、黃蓋、程普、韓當則為孫堅北上之後擴軍之將領,³⁵可見孫堅的基本武力除部分來自江南鄉里, 更多是在轉戰江北之後擴充而來的, 其數量最盛時當在數萬人以上。

《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載, 孫堅死後, 其子孫策「往復見術, 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³⁶據此, 曾有數萬人的孫堅軍隊, 在孫堅死後, 餘兵竟只有千餘人, 不甚合理。宮川尚志認為, 孫堅是袁術廣義的部曲, 孫堅死後, 其軍隊一部分由其侄孫賁所統率, 其餘則大部分歸袁術。³⁷方詩銘認為, 孫堅死後, 其餘兵應有數千人, 由孫堅侄孫賁(173-209)所統率, 孫賁並接任豫州刺史, 孫堅妻舅吳景則為丹楊太守, 隨後袁術又以孫賁為丹楊都尉, 孫賁所統率的孫堅餘部則轉入袁術手中。³⁸綜而言之, 孫堅死後, 其軍隊大部分歸袁術所有, 只有手創餘兵數千人曾由孫賁所統率, 隨後亦歸袁術, 嗣後孫策再從袁術索得其父的餘兵, 可能只有千餘人。

三、孫策的創業與族群情勢

(一) 孫策的創業

孫策是孫堅長子, 陳壽記載他的人格特質是「美姿顏, 好笑語, 性闊達聽受, 善於用人」、「英氣傑濟, 猛銳冠世」。³⁹孫堅舉兵北上後, 孫策與其母居壽春, 「年十餘歲, 已交結知名, 聲譽發聞」,⁴⁰與揚州廬江郡舒縣的名士周瑜(175-210)相友善,⁴¹乃徙居

³⁵ 渡邊義浩, 〈孫吳政權の形成〉, 頁111。

³⁶ 晉·陳壽, 《三國志》, 卷46, 〈吳書·孫策傳〉, 注引《江表傳》, 頁1103。

³⁷ 宮川尚志, 《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會篇》, 第三章第三節, 〈三國吳の政治と制度〉, 頁235。

³⁸ 據方詩銘考論, 袁術以任命孫賁為丹楊都尉交換取得孫堅餘眾, 而此時孫堅餘眾有數千人, 參見方詩銘, 〈「丹陽兵」與「東據吳會」——論丹陽郡在孫策平定江東戰爭中的地位〉, 《史林》, 1989: S1 (上海, 1989.12), 頁16-22。

³⁹ 晉·陳壽, 《三國志》卷46, 〈吳書·孫策傳〉, 頁1104、頁1112-1113。

⁴⁰ 晉·陳壽, 《三國志》卷46, 〈吳書·孫策傳〉, 注引《江表傳》, 頁1101。

舒，「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⁴²可見孫策不單只如其父的勇猛，還在江、淮士大夫之間頗得聲名。

孫堅死時，孫策年方 17 歲，與母前往投靠已任丹楊太守的舅父吳景，並「因緣召募得數百人」，⁴³途中遭遇到「涇縣大帥」祖郎的襲擊，「幾至危殆」。⁴⁴興平元年（194），孫策投靠袁術，求得孫堅餘兵，但袁術對孫策始終有所猜忌，此時袁術因向廬江太守陸康（126-195）索軍糧未果而欲出兵，而孫策曾受陸康羞辱，袁術乃命孫策攻陸康。孫策率孫堅餘兵攻克廬江，陸康及陸氏宗族隨在廬江的百餘人死者將半，震動江東。孫策屠殺吳郡名族陸氏，不但造成江東大族對孫策的疑懼和戒備，也和朝廷所任命的揚州刺史劉繇（156-197）反目。⁴⁵

袁術曾許諾孫策為九江太守而未行，攻克廬江之後，又未屢諾命孫策為廬江太守，讓孫策頗為失望。正好此時揚州刺史劉繇部下攻擊丹楊的吳景，吳景退守歷陽，孫策乃向袁術請命助軍，「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眾五六千」，⁴⁶孫策即憑此軍隊轉戰江東。孫策軍隊於興平二年十二月過江，所向皆破，揚州刺史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竄伏山區，孫策乃趁機擴大召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⁴⁷然而，孫策率領過江的軍隊以淮泗人為主體，又得不到江東大族的支援。這使得孫策軍隊完全不具備返回

⁴¹ 關於廬江周氏為東漢末揚州一流的名門，參見渡邊義浩，〈孫吳政權の形成〉，頁 92-94；晉文，〈周瑜的家族與家庭〉，《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4：1（南京，2014.1），頁 4-7；湯奇學，〈周瑜研究兩題〉，《安徽史學》，2014：4（合肥，2014.7），頁 157-160。

⁴²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頁1101。

⁴³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頁1101。同書引《江表傳》則載孫策先投靠袁術，袁術再叫他去依附吳景。

⁴⁴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江表傳》，頁1103。

⁴⁵ 田餘慶認為，孫堅餘兵多為江淮兵。參見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65。

⁴⁶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頁1102。

⁴⁷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江表傳》，頁1105。

鄉梓為父老所歡迎的形象，而儼然是一支浩浩蕩蕩的袁術入侵之師，是外來的征服者。⁴⁸

孫策此時雖已攻取江東各郡城，但其周遭遍布敵對勢力，除前述逃往山區の朝廷命官遺部之外，更有土著色彩濃厚的險縣大帥，如「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⁴⁹「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⁵⁰這些朝廷命官殘餘勢力與地方土豪及山越的結合，成為孫策立足江東的最大威脅，孫策盡全力一一擊破之，才初步穩固了其在江東的統治。

當孫策在江東坐大之後，和袁術的關係也日趨惡化，乃利用建安二年（197）袁術僭號稱帝的機會，正式發書決裂。此時華北曹操、袁紹爭霸形勢漸形成，曹操乃趁機拉攏孫策，建安三年（198）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侯。不久袁術敗死，其餘部被廬江太守劉勳所併，孫策乃發兵偷襲廬江，勳眾盡降，劉勳逃奔曹操，曹操為全力對付袁紹，對孫策也只能全力安撫。⁵¹

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孫策陰謀襲許昌迎漢帝，兵未發，卻在一次出獵中被故吳郡太守許貢（?-197）的門客所射殺身亡，時年 26 歲。

（二）孫策時期的族群情勢

孫策猝死，孫氏政權陷入危急，孫策弟孫權臨危繼統，《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載當時形勢為：

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豫章、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⁵²

⁴⁸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68。

⁴⁹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吳錄》，頁1105。

⁵⁰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頁1104。

⁵¹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猢猻難與爭鋒也』」，頁1105。

⁵²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15-1116。

簡言之，孫氏政權所能控制的地區仍然只侷限於郡城周圍的平野地區，文臣武將則多為淮泗之舊人，不但江東英豪在各地旁觀，連由北方流亡江南的「賓旅之士」也未歸心，而深險之地的山越土豪更是無法掌握了。這種情勢的形成，試略為分析。

孫策的軍隊，初起之時，僅募兵數百人，後得父孫堅餘兵千餘人，及攻劉繇，未渡江，眾五、六千人，至此士兵多為淮泗人。既渡江破走劉繇，眾至數萬，劉繇死，孫策復得劉繇餘眾萬餘人，至此士兵當有不少江南人。⁵³袁術死後，孫策再攻取廬江皖城，得袁術部曲三萬餘人，劉勳逃奔曹操，孫策再「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⁵⁴此時自袁術、劉勳收得的士兵又多為淮泗人。據陶元珍合計，迄孫策之歿，東吳之眾當達十萬矣，其數或稍有誇大，暫且不論。⁵⁵僅就其士兵來源觀之，則淮泗兵與江南兵約略參半。⁵⁶

孫策的軍隊，雖淮泗兵與江南兵參半，但其領導核心的文臣武將除孫氏宗親之外，則多為淮泗人士。黃熾霖曾統計孫策的討逆將軍及會稽太守的府屬，認為討逆將軍府屬以淮泗集團為主，會稽太守府屬則以南方人士為多，整體的領導架構接近平衡，並非如過去所認為的北方人多於南方人。⁵⁷然而權力有時難以量化，

⁵³ 方詩銘強調孫策舅曾據有丹陽，以及孫策渡江之後以丹陽為根基地，東據吳會，都看重丹陽為精兵之地，因此孫策渡江之後擴軍，當有不少丹陽精兵。參見方詩銘，〈「丹陽兵」與「東據吳會」——論丹陽郡在孫策平定江東戰爭中的地位〉，頁19-22。

⁵⁴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江表傳》，頁1108。

⁵⁵ 按據陶元珍所列兵數，合計約略7萬人，10萬之說恐有誇大之嫌，參見陶元珍，〈三國吳兵考〉，《燕京學報》，13（北京，1933.6），頁53。據《三國志》，赤壁戰前緊要關頭，周瑜向孫權請兵5萬，孫權回說：「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可見孫策死時，孫吳已有軍10萬之說，確有誇張。晉·陳壽，《三國志》，卷54，〈吳書·周瑜傳〉，引《江表傳》，頁1262。何茲全考孫吳滅亡時有兵23萬，而孫權時期向山越搜兵不下13、14萬，且軍隊尚有其他來源，如此扣除後，說孫策過世時，東吳軍隊已有10萬，也確實有所誇張。參見何茲全，〈孫吳的兵制〉，《中國史研究》，1984：3（北京，1984.8），頁93-106。

⁵⁶ 田餘慶認為孫策軍隊多為淮泗兵，其在江南招募者不多，恐不精確。參見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65。

⁵⁷ 黃熾霖，《從中央文官之地域分布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頁50、頁168。

而孫策時期的權力結構，也不能只看孫策所任兩府的府屬，在其控制範圍內奉其號令的郡太守及領兵將領更為重要。《三國志·吳書·孫策傳》載孫策攻佔江東之後：

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楊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⁵⁸

據此，孫策控制地區的郡太守及領兵將領名單中，吳景為孫策舅父，孫賁、孫輔為孫氏族人，丹楊朱治為孫堅元從舊臣，彭城張昭（156-236）、廣陵張紘（153-212）、秦松、陳端則為淮泗人物，可見孫策時期的領導核心除孫氏宗親之外，幾乎多為淮泗人士。

孫策政權雖以江北的淮泗集團為核心，然而許多流寓江東的北方賓旅之士卻徬徨未前。當時流寓江東的士大夫原多聚集在劉繇、王朗（152-228）、華歆（157-232）等北方名士為江東牧、守者的周圍。⁵⁹孫策以袁術部曲來攻，劉繇奔死豫章，王朗、華歆先後北歸，流寓其下的士大夫有的依附於江東大族，有的依附於淮泗武將，與孫策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甚至有的見北方情勢漸趨穩定而北返投附曹操，形成極不利於孫策的政治風潮，⁶⁰這就是所謂的「賓旅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

至於佈在州郡的江東英豪，對孫策以袁術部曲率淮泗兵團入侵，更是充滿著敵意或冷眼觀望，其原因大要為：富春孫氏出身孤微，其門第低下，本難見容於江東大族；孫策屠戮吳郡陸氏子弟，加深江東大族對他的仇視心理；孫氏父子為袁術部曲，而袁術篡逆之心，讓忠於漢室者反感。⁶¹對此情勢，孫策為站穩統治，

⁵⁸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頁1104。

⁵⁹ 「繇乃移居曲阿。值中國喪亂，士友多南奔，繇攜接收養，與同優劇，甚得名稱」。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76，〈劉寵傳附劉繇傳〉，頁2479。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78。

⁶⁰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78-279。

⁶¹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66-269；王令雲，〈試論孫吳時期淮泗集團的

不得不誅殺敵對者，這就是所謂「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⁶²關於孫策之誅戮江東英豪，田餘慶引陳琳（160-217）為曹操所作〈檄吳將校部曲文〉，已有精闢的分析，⁶³在此毋須再論。《三國志·吳書·陸績傳》載：

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遙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異焉。⁶⁴

按陸績（188-219）即陸康之子，其家族受戮，此時大聲反對武力鎮壓，既是抗議，也是在思考另一種新的關係。蓋江東人士見孫策據有吳、會已是難於改變的事實，且孫策已與袁術決裂並受朝廷拜命，在其下任職已無背離朝廷之虞，只要孫策不再任意殺戮，為了家族及自身利益，兩者並非絕無合作的空間，而孫策也知道要在江東立足，不能只靠殺戮，因此也極力拉攏江東人士。前述孫策會稽太守的府屬，以南方人士為多，或許即是以南人治南人，鞏固其佔領地的策略。⁶⁵

江東大族與孫吳政權關係的發展，也與當時江南另一股勢力，即山越與宗部等土著的動向有關。山越為居於山區的非漢族土著，⁶⁶宗部可能為逃避賦役進入山區의漢族武裝組織，然而在東漢末年兩者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常混為一體，其首領在史書中常稱為某地帥、民帥、賊帥。⁶⁷孫策創業過程中，屢屢遭受此股勢力

興衰〉（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2006），頁6。

⁶² 晉·陳壽，《三國志》，卷51，〈吳書·孫韶傳〉，引《會稽典錄》，頁1214。

⁶³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70-277。

⁶⁴ 晉·陳壽，《三國志》，卷57，〈吳書·陸績傳〉，頁1328。

⁶⁵ 黃熾霖，《從中央文官之地域分布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頁50。

⁶⁶ 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頁10-16。

⁶⁷ 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頁7-14；陳連慶把漢末江南土豪在史書中稱大帥、某地帥、賊帥、渠帥者，都視為山越，參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234-242。

的挑戰。如孫策初起投附其舅吳景時，即遭受到「涇縣大帥」祖郎的襲擊，「幾至危殆」。⁶⁸當孫策渡江攻佔江東各郡時，劉繇敗退，與部下太史慈（166-206）亡入山中，太史慈「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⁶⁹不久，孫策又掃蕩鄉野地區，擊破嚴白虎等土豪勢力，才逐漸穩固其在江東的統治。建安二年，孫策以會稽太守巡視各地，行到錢塘，吳郡太守陳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與賊丹楊、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⁷⁰孫策發覺之後，奮力討平之。孫策與袁術決裂後，建安三年袁術「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⁷¹孫策署宗帥祖郎為門下賊曹。由上可見，孫策據有江東，最大的威脅來自潛藏各地的山越及宗帥豪強，直到孫策臨終之際，「深險之地猶未盡從」，即由於此。

山越、宗部等土著勢力和江東大族之間是有矛盾的，《三國志·吳書·賀齊傳》載：

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⁷²

按山陰賀氏為江東名族，⁷³斯從為縣大族，漢代邊郡大姓往往出身

⁶⁸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江表傳》，頁1103。

⁶⁹ 晉·陳壽，《三國志》，卷49，〈吳書·太史慈傳〉，頁1188。

⁷⁰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江表傳》，頁1107。

⁷¹ 晉·陳壽，《三國志》，卷51，〈吳書·孫輔傳〉，引《江表傳》，頁1212。

⁷² 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賀齊傳〉，頁1377。

⁷³ 賀氏為會稽山陰名族，參見劉淑芬，〈六朝會稽士族〉，收入劉淑芬，《六朝的
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255-315。

於非漢族之土著，因此斯從有可能即為山越族，⁷⁴賀齊（?-227）斬斯從，可視為江東大族與土著山越之間的衝突。蓋江東大族在江南的發展，常為爭奪資源而造成其與土著山越之間的矛盾衝突，孫策引用賀齊，即利用江東大族與土著山越之間的矛盾，以南人治南人。孫策引用江東人士助其討平山越，史籍所見尚有數例，如會稽餘姚董襲（?-215），孫策署為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⁷⁵吳郡餘杭凌統（189-217），「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手，遷破賊校尉」。⁷⁶

綜而言之，孫策初興之時，以袁術部曲率淮泗武力攻進江東，江東各股勢力包括朝廷命官、江東大族、山越土著等皆群起抵抗。孫策以淮泗人物為領導核心，據有吳、會，擴大軍隊，誅戮江東英豪，再利用江東大族與土著山越之間的矛盾，引用部分江東人士助其討平山越，逐漸穩固其統治，但直到孫策臨終之際，江東大族大多仍是冷眼旁觀，連北方流亡江南的「賓旅之士」也以安危去就為意，尚未歸心，而深險之地的山越土著則更無法掌握了。

四、孫權的立國與族群情勢

（一）孫權的立國

孫權字仲謀，為孫策之弟，建安五年春，孫策臨終之前託付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⁷⁷張昭「率群僚立而輔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⁷⁸蓋此時張昭要先取得江東政府的合法性，才能號令各地。九月曹操在官渡大

⁷⁴ 陳連慶引友人斯維至教授口述為證，斯從為山越族，浙東剡縣斯氏至今仍為大族。參見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頁237-238。

⁷⁵ 晉·陳壽，《三國志》，卷55，〈吳書·董襲傳〉，頁1291。

⁷⁶ 晉·陳壽，《三國志》，卷55，〈吳書·凌統傳〉，頁1295-1296。

⁷⁷ 晉·陳壽，《三國志》，卷52，〈吳書·張昭傳〉，注引《吳歷》，頁1221。

⁷⁸ 晉·陳壽，《三國志》，卷52，〈吳書·張昭傳〉，頁1220。

敗袁紹，十月聞孫策死，欲乘機攻江東，因先前奉孫策入朝的張紘諫言而止，乃表孫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等於是承認孫權繼承孫策之職，領有江東，孫氏政權暫時穩住陣腳，但面對已掌握北方霸權的曹操，孫氏能否繼續保有江東，各方都心存觀望。

對孫氏政權最沒信心的，竟然是自己的孫氏宗族。孫權剛接任，廬陵太守孫輔「恐權不能保江東，陰遣人齎書呼曹操。行人以告，權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⁷⁹孫策的從兄定武中郎將孫翊，也在此時「屯烏程，整吏軍士，欲取會稽」事敗，⁸⁰可見孫氏政權的核心都起了動搖。孫策任命的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孫權，孫權舉兵討伐，「屠其城，梟術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⁸¹偏遠地區也有動搖情勢，《三國志·吳書·虞翻傳》載：

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⁸²

孫權面臨這種情勢，《三國志·吳書·孫權傳》載其應對處置：

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⁸³

程普為孫堅元從舊臣，張昭、周瑜、呂範為孫策元從舊臣，皆為

⁷⁹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卷63，〈漢紀五十五〉，「獻帝建安五年十月條」，頁2039；陳壽，《三國志》，卷51，〈吳書·孫輔傳〉，注引《典略》，頁1212，有較詳細的記載。

⁸⁰ 晉·陳壽，《三國志》，卷57，〈吳書·虞翻傳〉，注引《吳書》及《會稽典略》，頁1319。

⁸¹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頁1116。按《建康實錄》作「部曲二萬餘人」，參見唐·許嵩，《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1，〈吳太祖上〉，頁7。

⁸² 晉·陳壽，《三國志》，卷57，〈吳書·虞翻傳〉，頁1319。

⁸³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16。

淮泗人士，可見仍以淮泗人士為權力核心，「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應是廣納江東大族以及流寓的「賓旅之士」，魯肅（172-217）、諸葛瑾（174-241）皆為淮泗名士，此時入孫權幕府象徵部分「賓旅之士」的歸心，「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即展開對內恩威並施的統治，詳情後論，如此，孫氏政權渡過了初步的考驗。

官渡戰後，曹操以清除袁紹殘餘勢力為要務，雖曾一度於建安七年（202）下書責求孫權送子質任被拒，⁸⁴也無可奈何。基本上在建安十三年擴清華北之前，曹操無暇南顧，而孫權也在這段期間穩住江東，並溯長江，兵鋒指向荊州。建安八年（203）十月，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車，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⁸⁵乃還師，命諸將討平鄱陽、會稽、樂安、建安、漢興、南平等山越，「料出兵萬人」。⁸⁶建安十二年（207），孫權再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建安十三年（208）五月，孫權終於斬殺黃祖，報殺父之仇，虜其人民數萬口。

正在此時，曹操掃平華北，稱丞相，兵鋒南指，七月南擊劉表，劉表病卒，九月劉表子劉琮降曹操，投附劉表的劉備急忙逃走，曹操大軍自江陵順江而下，乃向孫權致書招降，《三國志·吳書·孫權傳》注引《江表傳》載：

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群臣，莫不嚮震失色。⁸⁷

孫權出示招降書給群臣，群臣之所以「莫不嚮震失色」，自然是深

⁸⁴ 晉·陳壽，《三國志》，卷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頁1260-1261。
按曹操常以質任為手段，要脅他人臣服就範，參見宋杰，〈漢末三國時期的「質任」制度〉，《北京師院學報》，1984：1（北京，1984.1），頁4-13；朱子彥〈漢晉之際質任現象綜論〉，《歷史研究》，2015：6（北京，2015.12），頁43-60。

⁸⁵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16。

⁸⁶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64，〈漢紀五十六〉，「獻帝建安八年十月條」，頁2052。

⁸⁷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頁1118。

知雙方兵力懸殊，無力抵抗，因此自腹心張昭以下幾乎都主張投降，唯有魯肅、周瑜等少數人力主抗戰。⁸⁸張昭等投降派，在理念上仍奉漢室為正朔，今曹操挾漢室掃平群雄，若力不足於對抗，不如迎之；主戰派的周瑜則分析曹軍的弱點，認為曹操虛張聲勢，力戰足於敗曹，⁸⁹魯肅則在抗曹之外更勸孫權進一步圖謀帝王之業。⁹⁰可見在此大軍壓境的關鍵時刻，孫吳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顯現化，最後孫權採主戰派之議，聯合劉備在赤壁大敗曹操，渡過孫吳政權最大的危機。⁹¹

赤壁之戰，曹操遭受到空前的大挫敗，乃轉戰西北，其後雖曾再出兵攻吳，氣勢已大不如前，孫吳政權基本上已屹立不搖。此後數年，孫吳對外保持與劉備聯盟，對內則擴大邊地的征討。建安十八年（213）八月以後曹操再南攻的壓力愈來愈大，而孫劉聯盟也因荊州爭奪問題而生裂痕，孫權遂於建安二十二年（217）三月遣使向曹操請降修好，曹操則趁機分化，促使孫、劉之間的荊州爭奪戰，吳將呂蒙（178-220）殺蜀將關羽（160-220）。⁹²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曹操上表以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孫權則「上書稱臣，稱說天命」，慫恿曹操稱帝。⁹³

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正月，曹操死，其世子曹丕（187-226）代為丞相、魏王，六月曹丕決計南征以立威，孫權隨之遣使奉

⁸⁸ 晉·陳壽，《三國志》，卷54，〈吳書·周瑜傳〉，頁1261；晉·陳壽，《三國志》，卷54，〈吳書·魯肅傳〉，頁1269-1270；另外，黃蓋、程普等孫堅元從武將，在赤壁之戰中亦為抗曹之主力，顯示孫堅元從之忠貞不二。參見渡邊義浩，〈孫吳政權の形成〉，頁85。

⁸⁹ 晉·陳壽，《三國志》，卷54，〈吳書·周瑜傳〉，頁1261-1262。

⁹⁰ 關於張昭、周瑜、魯肅理念上之差異，參見渡邊義浩，〈孫吳政權の形成〉，頁99-103。

⁹¹ 關於赤壁之戰論者已多，因非本文要點，不擬多論，可參考張靖龍，《赤壁之戰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⁹² 關於赤壁戰後三國的外交關係，參見尹韻公，〈從荊州爭奪戰看三國前期的外交鬥爭〉，《文史哲》，1981：5（濟南，1981.5），頁37-42；張大可，〈略論三國形成時期的外交〉，《學術月刊》，1987：9（上海，1987.9），頁65-70。

⁹³ 曹操收到孫權以天命相勸的書信後，以書信示群臣說：「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表示不會上當。晉·陳壽，《三國志》，卷1，〈魏書·武帝紀〉，注引《魏略》，頁52。

獻，十月曹丕退兵並行禪代稱帝，孫權即刻遣使稱藩，曹丕拜孫權為大將軍，冊封吳王加九錫，魏吳關係繼續維持穩定。孫權對曹魏卑詞稱臣，是因為奪荊州殺關羽之後孫劉關係破裂，避免兩面受敵之策略。⁹⁴

劉備在曹丕篡漢後，翌年（221）四月亦在成都稱帝，同年七月並大舉興兵伐吳以報關羽被殺之仇，孫權以陸遜（183-245）為都督領兵拒之。魏黃初三年（222）六月，⁹⁵陸遜在夷陵大敗劉備，斬殺俘獲數萬人，劉備退居白帝城，隔年（223）四月病死白帝城。當孫、劉對陣期間，曹丕正急於鞏固帝位，採取旁觀，⁹⁶待吳軍大勝，曹丕嫉妒，乃要求孫權送太子孫登（209-241）入質，孫權辭讓不受。黃初三年九月，曹丕遂發兵興討，孫權再卑詞求和不成，乾脆改元黃武，臨江自守，以示不屈。魏軍久戰無功，只好於次年（223）三月全面撤軍，群臣趁機勸孫權稱帝，孫權未接受。黃武三年（224）九月，曹丕再親率大軍至廣陵，望江興嘆：「彼有人焉，未可圖也」，⁹⁷乃還，孫吳再次確立其割據之勢。不過為避免兩面為敵，孫權再遣使與蜀漢修好，回到聯劉抗曹的路線，三分天下的格局已大致底定，但孫權為營造政權的正當性，直到黃龍

⁹⁴ 關於當時吳蜀關係，參見趙國華，〈三國時期的吳蜀關係〉，收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古代史論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215-228；趙國華，〈三國時期的魏吳關係〉，收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古代史論集》，頁229-243；謝偉傑，〈孫吳「彈性外交」述論〉，《漢學研究》，22：1（臺北，2004.6），頁21-45。

⁹⁵ 本文紀年採東漢及孫吳年號，但在西元220-222年之間，曹魏篡漢，孫吳向曹魏稱臣亦採其年號。近年出土吳簡載有「建安二十七年」之年號，曾被疑孫權雖向曹魏稱臣，但不用曹魏年號黃初，仍續用東漢年號建安，但羅新引用近來對吳國銅鏡的研究，孫吳確有採用黃初之年號，認為吳簡所載「建安二十七年」之年號，是後來追記的，原因是孫吳與曹魏決裂後，對曾奉行黃初年號有所忌諱。參見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5（北京，1999.5），頁26-44；羅新，〈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10（北京，2002.10），頁92-95。

⁹⁶ 潘民中，〈曹魏對蜀吳夷陵之戰取觀望態度原因初探〉，《許昌師專學報》，1990：4（許昌，1990.12），頁52-57。

⁹⁷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31。

元年才稱帝號。⁹⁸

（二）孫權時期的族群政治

前述黃初三年九月，曹丕因向孫權要求遣子質任不成而發兵興討，孫權卑詞求和，陳壽對此認為：「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屬」，⁹⁹又在《三國志·吳書·賀齊等傳》的傳末〈評曰〉云：「山越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¹⁰⁰認為山越之患為孫吳對魏示弱的原因，其說是否中肯，不妨再回顧整體的形勢發展來加以檢視，並進一步考察孫權如何操弄族群關係，以助其建國。

孫策猝死、孫權繼統之初，孫吳政權確實還很脆弱，幸好當時北方袁、曹還在對抗，孫權可致力於內部的安輯。當時江東形勢，如前所述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¹⁰¹孫策所留下來的政權是以淮泗集團為核心的政權，危急之初連孫氏宗族都沒有信心，遑論北方流寓的賓旅之士，以及江東大族與山越土著。面對這種情勢，孫權在打擊叛逆的同時，全面展開拉攏各方勢力的工作。

首先，對於拉攏北方流寓的賓旅之士，同為北方出身的張昭

⁹⁸ 田餘慶認為，孫吳霸業之起在魏、蜀前，稱王稱帝卻在魏、蜀後，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等待政權根基進一步穩固的江東化的完成，參見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93。高敏認為，孫權最晚稱帝是需要較多時間以緩解北方流寓地主集團同江東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鬥爭，參見高敏，〈試論孫吳建國過程中北方地主集團與江東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鬥爭〉，頁27。然而筆者認為，孫權既稱臣於曹操，在曹丕篡漢之前，絕無稱帝之可能，即使曹丕篡漢之後，為避免腹背受敵，亦只能再卑詞事魏，只有在曹丕大軍南征無功的黃武二年（223）之後始有可能，孫吳稱帝不在此時，亦不在田氏所謂江東化完成的黃武四年（225），而要再等到黃龍元年（229），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要尋找稱帝的正統性基礎。參見柳瀨喜代志，〈吳王朝受命譚考〉，《中國詩文論叢》，13（東京，1994.10），頁29-31；渡邊義浩，〈孫吳の正統性と國山碑〉，《三國志研究》，2（東京，2007.7），頁40-65；魏斌，〈孫吳年號與符瑞問題〉，《漢學研究》，27：1（臺北，2009.3），頁31-55。

⁹⁹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25。

¹⁰⁰ 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賀齊傳〉，傳末〈評曰〉，頁1395。

¹⁰¹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15-1116。

與周瑜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張昭為徐州彭城的名士，¹⁰²「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¹⁰³周瑜則為揚州名士，為孫策少年在江淮交結的至友，「義同斷金」，¹⁰⁴在孫策攻占江東的過程中戰功彪炳。張昭與周瑜不僅只扮演著文臣武將的核心角色，更重要的是對流亡士民所起的號召作用，陸機（261-303）《辨亡論》對此有最傳神的評語云：

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¹⁰⁵

總之，北方流寓的賓旅之士，為自身的安危與生計，在孫權取得朝廷拜授的情況下，紛紛接受張昭、周瑜的號召而加入孫氏政權。

其次，孫權又積極引用江東大族。前述孫策攻佔江東，為站穩腳根而誅戮江東英豪，但也積極引用江東人士，只是江東大族多冷眼旁視，親附的人物並不多。孫策臨終前特別囑咐孫權：「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¹⁰⁶孫權確實也盡全力拉攏江東大族，而江東大族見孫氏統有江東的現實暫難改變，孫權也是朝廷合法的命官，為自身安危與家族利益，不得不接受其徵召。不過有的江東大族被動消極，與孫權貌合神離，如會稽虞翻（164-233）與魏騰，也有的積極任事，為孫權建功立業，如吳郡顧雍（168-243）與陸遜。¹⁰⁷然而，這只是一時的妥協，當曹操大軍壓境，群

¹⁰² 關於張昭在孫吳政權草創過程中的地位，參見王永平，〈張昭政治地位的變遷及其與孫權衝突的原因〉，收入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163-169。

¹⁰³ 晉·陳壽，《三國志》，卷52，〈吳書·張昭傳〉，頁1219。

¹⁰⁴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江表傳》，頁1101。

¹⁰⁵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54，〈陸機傳〉，頁1468。

¹⁰⁶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頁1109。

¹⁰⁷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83-290。如後所述，虞翻雖在孫權繼統之初，

臣「莫不嚮震失色」，連淮泗集團的核心人物張昭都主張投降了，何況暫時妥協觀望的江東大族。因此，江東大族的徹底歸心，要在赤壁戰後，蓋孫吳政權最嚴重的威脅業已解除，江東大族為往後的生存與發展，除了仕吳，已別無選擇，況且這又與孫吳對山越的政策息息相關（詳後）。

再次，關於山越、宗部等土著勢力。相對於賓旅之士與江東大族的歸附，山越土著卻始終與孫吳政權處在敵對的地位。¹⁰⁸山越之民多分散在深險之地，常與山中大族和地方豪強結為一體，盤據地方，成為孫氏政權立基江東與擴大統治之最大障礙。然而，山越對孫氏最大的威脅主要是在孫策創業的時期，如前所述，孫策與母前往投靠舅父吳景，途中遭受到「涇縣大帥」祖郎的襲擊，「幾至危殆」，¹⁰⁹因為這時孫策隊伍只有數百人。孫策攻入江東之後，所向彼靡，但盤據山區的山越與地方豪強仍然是最大的威脅。據研究，孫策據江東五年期間與山越的戰爭可考者計有 12 次之多，¹¹⁰說山越是孫策最大的敵人並不為過。然而孫權統事以後，「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¹¹¹來自山越直接攻擊的威脅已大不如前。史籍所見來自山越最大的一次威脅是，建安八年十月，孫權西伐黃祖之時，因山越來襲而迫使孫權不得不還師討伐，結果討平山越之後，「料出兵萬人」。¹¹²此後對山越的戰爭，幾乎都是孫吳主動出擊，掠奪山越人口，如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前夕，吳將賀齊又在丹楊、黟、歙等山越核心區，大事征

曾效力穩定情勢，但那可能只是一時為自身的利害考量，不表示積極歸心。

¹⁰⁸ 毛漢光在分析孫吳政權之社會成分時，也注意到山越土著未如其他勢力加入孫氏政權，而與孫氏政權處於對立狀態。參見毛漢光，〈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收入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107-138。

¹⁰⁹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江表傳》，頁1103。

¹¹⁰ 高亞偉，〈孫吳開關蠻越考（下）〉，頁12。

¹¹¹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16。

¹¹²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頁1116；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賀齊傳〉，頁1378。

討，降其眾四萬餘戶，¹¹³正是從山越掠奪人力補充兵源。赤壁戰前，吳將黃蓋向曹操詐降的書信云：「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¹¹⁴其說詞能取信於曹操，亦可說明孫吳的軍隊確實有相當比例來自山越。

赤壁戰後，曹操曾數次策動山越為內應圖謀孫吳，結果並無所獲。如建安十九年（214），「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¹¹⁵被呂蒙平定；建安二十一年（216），「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¹¹⁶被賀齊平定，以上之「鄱陽賊帥」、「鄱陽民尤突」一般認為即山越；¹¹⁷建安二十二年，「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¹¹⁸被陸遜討平之。可見曹操雖曾想策動山越為內應，但都很快的被平定，對孫吳構不上嚴重的威脅。

總之，山越對孫吳最大的威脅主要是在孫策時期，孫權統事以後山越雖然還有潛在的威脅，但並不如想像的嚴重，因此說山越的威脅讓「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¹¹⁹恐怕是言過其實。¹²⁰黃武二年（223）四月，孫權拒絕群臣勸即尊號時，曾說當年卑詞受魏封王之因：「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¹²¹亦即「卑詞魏氏」，乃是在與劉備爭奪荊州之後關係惡化，為避免兩面受敵的外交策略。

¹¹³ 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賀齊傳〉，頁1378-1379。

¹¹⁴ 晉·陳壽，《三國志》，卷54，〈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頁1263。

¹¹⁵ 晉·陳壽，《三國志》，卷54，〈吳書·呂蒙傳〉，頁1276。

¹¹⁶ 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賀齊傳〉，頁1380。

¹¹⁷ 袁剛，〈孫吳鄱陽郡宗民暴動及其性質〉，《文史哲》，1987：4（濟南，1987.5），頁54-58；周兆望，〈孫吳時期江西境內的山越及其對經濟開發的貢獻〉，《爭鳴》，1992：3（南昌，1992），頁58-63。

¹¹⁸ 晉·陳壽，《三國志》，卷58，〈吳書·陸遜傳〉，頁1344。

¹¹⁹ 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賀齊傳〉，傳末〈評曰〉，頁1395。

¹²⁰ 呂錫生認為，一般史書或論著有誇大山越對孫吳威脅之嫌。參見呂錫生，〈山越在東吳立國中的作用〉，《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3（金華，1984.6），頁63-68。

¹²¹ 晉·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頁1130。

既然山越對孫權之威脅已不再那麼嚴重，孫權何以仍要大事興討，而山越也始終與孫吳處在對立面？蓋孫吳政權與山越的敵對，是由諸種複雜的因素所造成的。東漢末年的混亂局面，盤據各地的宗部大帥與山越酋豪趁機而起，孫策軍入江東，山越酋豪在朝廷或袁術以印綬拜官的引誘下，展開抵抗孫策的戰爭。後來曹操策動山越為內應，也是以朝廷印綬拜官為誘，可見山越酋豪對接受朝廷印綬以獲得官職和爵位的強烈欲望，¹²²這或許有利於其在地方社會的地位鞏固，然而山越被充當內應，卻加深其與孫吳政權的敵對。另一方面，山越之民多在深險之地，不納稅服役，孫吳政權若欲擴大其統治區域，甚至要籌備軍糧與兵力，難免要從事對山越的征討，而江東大族在各地的發展，也常與山越有所衝突，於是孫吳君臣遂多以熟悉地方情勢的江東大族來鎮壓山越，達到一石二鳥之利，或者說孫吳君臣是在盤算之後，以拉攏、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如前所述，孫氏政權既已據有江東，而且日趨穩固，江東大族除了仕吳，已別無選擇，況且同在匡輔漢室的旗幟之下，南北士人的經學傳承雖有些微的差異，¹²³但在同受儒學的文化傳統上卻是同聲共氣，因此在族類歸屬上彼此較為親近。相對的，山越的異族形象較難於被南北士大夫所授受，¹²⁴而江東大族在江南的發展，常為爭奪資源而與山越之間有矛盾衝突，因此江東大族也樂於助孫吳討平山越，以擴大其在地方的實力與利益，以下再舉證論述之。

如前所述，孫策時期即已引用賀齊、董襲、凌統等江東大族助其討平山越。孫策死後，各地騷動，熟悉地方情勢的江東大族曾助孫權化解地方危機。如虞翻為富春長，孫策死，「諸長吏並欲

¹²² 關尾史郎，〈曹魏政權與山越〉，《文史哲》，1993：4（濟南，1993.4），頁30-33。

¹²³ 王永平，〈孫吳學術文化風尚考論〉，收入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338-374。

¹²⁴ 關於山越的異族形象，參見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頁10-12。

出赴喪」，虞翻恐山民有變，「留制服行喪」，因而安定地方；¹²⁵又如「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顧）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¹²⁶這是江東大族為孫權繼任化解地方危機之例。至於為孫權進一步征討山越的江東大族，可以賀齊、陸遜、全琮（198-249）、凌操（?-203）為例。賀齊自孫策時期即是征討山越的名將，建安八年，討伐山越，「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料出兵萬人」，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前夕，又討降山越 4 萬餘戶「斬首七千」，建安二十一年又斬首數千，「料得精兵八千人」；¹²⁷陸遜為吳郡士族陸康族人，孫權繼統之後始仕幕府，孫權以孫策女配之，顯示特意拉攏。《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載：

時吳、會稽、丹楊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¹²⁸

按陸遜向孫權「陳便宜，乞與募焉」，應即建言向山越掠奪人口，因此在一次征討之後，其部曲即擴張到二千餘人。史文又載：

（孫權）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峙，豺狼闖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都督。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¹²⁹

這是江東大族人物建言並親自領軍掠奪山越，「彊者為兵，羸者補

¹²⁵ 晉·陳壽，《三國志》，卷57，〈吳書·虞翻傳〉，頁1319。

¹²⁶ 晉·陳壽，《三國志》，卷52，〈吳書·顧雍傳〉，頁1225。

¹²⁷ 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賀齊傳〉，頁1378-1379。

¹²⁸ 晉·陳壽，《三國志》，卷58，〈吳書·陸遜傳〉，頁1343。

¹²⁹ 晉·陳壽，《三國志》，卷58，〈吳書·陸遜傳〉，頁1343-1344。

戶」最好的例子。此外，吳郡錢塘名族全琮，孫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¹³⁰這應是建安末年的事；吳郡餘杭凌統為孫策「平治山越」，已如前述，凌統死後其子凌操，孫權「使攝父兵」從擊山賊，後凌操向孫權進言「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孫權乃命其征討，結果「得精兵萬餘人」。¹³¹以上為孫吳討伐山越的名將賀齊、陸遜、全琮、凌操，皆為江東大族，這應該不是偶然，而是延續孫策以來以南人治南人政策的結果。

江東大族人物之所以積極建言、領軍掠奪山越，當然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孫氏初起之時，靠的是淮泗名士與豪族之文才武略，以及追隨他們的私家部曲，入據江東之後，為擴大實力以及默許江東大族擁有私家部曲的現實，授與部將軍隊並鼓勵其根據實地環境需要自己招兵買馬，擴充實力，論功行賞，甚至父子兄弟可以世襲領兵，激勵士氣，一般稱之為世襲領兵制，¹³²在這過程中熟悉地理條件和人文環境的江東大族獲利最大。¹³³如吳郡吳縣朱桓（177-238），深得孫權賞識，「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¹³⁴後以此軍隊督領諸將討平山越，遷官封侯。前述賀齊、陸遜、全琮、凌操等人，也都利用征討山越，擴張部曲，遷官封侯。不僅如此，孫吳對於有功的將領與官吏，又常以所領郡縣之租稅為俸祿及養兵費，又給予免除其佃客租稅與徭役的特權，即一般所謂的奉邑制與復客制，¹³⁵孫權自建黃武年號之後，逐漸廢止奉邑制，代之封

¹³⁰ 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全琮傳〉，頁1381。

¹³¹ 晉·陳壽，《三國志》，卷55，〈吳書·凌統傳〉，頁1297。

¹³² 關於孫吳的世襲領兵制，限於篇幅無法在此細論，參見高敏，〈孫吳世襲領兵制度探討〉，收入高敏，《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頁68-95；趙昆生，〈孫吳世襲領兵制研究〉，《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4（重慶，2003.12），頁18-22。

¹³³ 趙昆生，〈孫吳世襲領兵制研究〉，頁19。

¹³⁴ 晉·陳壽，《三國志》，卷56，〈吳書·朱桓傳〉，頁1312。

¹³⁵ 高敏，〈孫吳世襲領兵制度探討〉，頁84-90。

爵制，¹³⁶江東大族又是這些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綜而言之，以淮泗集團為核心的孫吳政權，為立足江東，在掃盪敵對勢力之後，必須拉攏、結合江南的各種勢力，其中山越土著敵對態勢最為強烈，又常被外部勢力策動，充當內應，因而始終與孫吳政權處在敵對的狀態。江東大族起初也是站在孫吳政權的對立面，但在衡量孫氏已據有江東的形勢後，為自身生存與家族之發展，不得不由敵對、旁視而妥協，況且孫氏與袁術決裂之後，受朝廷拜授，出仕其下並無違逆之虞，而且在族類歸屬上，相對於帶有異族色彩的山越，南北士人同受儒學，文化傳統上同聲共氣，而江東大族與山越之間又有衝突矛盾，在種種因素的加乘之下，以淮泗集團為核心的孫吳政權，乃採取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的策略，孫吳政權因而擴大其基層統治，並補充兵源與戶口，所謂「彊者為兵，羸者補戶」，據估計孫權時期自山越掠得兵數不下 13 萬人，¹³⁷孫吳能夠抵抗北方的曹魏與西邊的劉蜀，善戰的山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至於自山越所掠得難以估算的戶口，更是孫吳開發江南的重要勞動力。而江東大族也因支持孫吳討伐山越，更加穩固其地方的實力與利益，遷官封侯，甚至逐漸進入權力核心。學界論孫吳政權之江東化，多以江東大族取代淮泗集團為權力核心立論，如田餘慶以吳郡的陸遜與顧雍分居文武朝班之首，為孫吳江東化的完成，¹³⁸陸遜代呂蒙居上游統帥之任，在建安二十四年，顧雍代孫邵為相在黃武四年（225）。然而若不以權力結構為據，¹³⁹而是以孫吳政權與江東大族全面的結合來說，孫吳江東化的完成年代應可再提前幾年，至於以淮泗集團結合江東大族打擊山越的族群政治格局，終孫權之世未有重大的變

¹³⁶ 濱口重國，《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上卷第一部第十一，〈吳・蜀の兵制と兵戸制一附説 建初十二年正月籍〉，頁430-456。

¹³⁷ 參見陶元珍，〈三國吳兵考〉，頁53。何茲全，〈孫吳的兵制〉，頁97。

¹³⁸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頁293。

¹³⁹ 若據黃熾霖之統計，北方人及淮泗集團在孫吳政權的大部分官職中，始終較江東大族占有優勢。參見黃熾霖，《從中央文官之地域分佈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頁170-171。

動。

五、餘論：山越之敗亡

山越是孫吳族群政治下，最大的輸家。中國學者都稱山越為少數民族，其實在漢末的江南社會，山越的人口並非少數，他們是江南社會的土著原住民，由於未漢化或漢化較淺而始終被視為異族，事實上江東大族有許多也是由土著漢化（或說華夏化）而來，如吳四姓的顧氏。¹⁴⁰蓋江南之人原多為非華夏之土著，春秋時代南方之楚、吳、越，尚處於華夏化的邊緣，此後其上層統治階級逐漸華夏化，¹⁴¹不過即使到兩漢時期，未華夏化的土著仍多於華夏。魯西奇研究南北朝時期的「蠻」，認為當時長江中游及其周圍地區的蠻民戶口數，當遠遠超過同一地區著籍的華夏戶口數，¹⁴²那麼，在漢末三國時期作為江南土著民的山越，其人口數亦當遠多於華夏民。其次，山越之人多強健善戰，《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載：

丹楊山險，民多果勁，……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起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¹⁴³

孫吳軍隊多取自山越，故能征善戰，所謂「丹楊精兵」。¹⁴⁴

那麼，以人口居多數又好武習戰的山越，何以與孫吳將領對陣之後屢吃敗仗，終致淪落到被「彊者為兵，贏者補戶」的地

¹⁴⁰ 何啟民，〈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收入何啟民，《中古門第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頁79-119。

¹⁴¹ 關於春秋時期江南華夏化的討論，參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第九章，〈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故事〉，頁255-287。

¹⁴² 參見魯西奇，〈釋「蠻」〉，收入魯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頁23-56；羅新也認為，當時南方土著族群在數量上居於多數，參見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2009：2（北京，2009.4），頁4-20。

¹⁴³ 晉·陳壽，《三國志》，卷64，〈吳書·諸葛恪傳〉，頁1431。

¹⁴⁴ 關於丹陽精兵之善戰，參見方詩銘，〈「丹陽兵」與「東據吳會」——論丹陽郡在孫策平定江東戰爭中的地位〉，頁16-22。

步？史載多次的交戰，山越或與山越結合的豪強隊伍亦相當可觀，如孫策初入江東之時，遭遇到的山越及豪強：「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眾萬餘或數千」，¹⁴⁵「吳人嚴白虎等眾各萬餘人，處處屯聚」，¹⁴⁶這些隊伍數量當不下於孫策的軍隊，結果被孫策各個擊破；建安八年，賀齊率五千兵討伐山越，「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雖然「賊眾兵少」，仍被賀齊大破之，「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料出兵萬人」，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前夕，賀齊又討降山越四萬餘戶，「斬首七千」。¹⁴⁷可見數多又善戰的山越及豪強隊伍，在與孫吳將領對陣之後，都敗退下來。呂錫生認為，山越之民多分散在深險之地，沒有嚴密的部落組織和統一的部落首領，常依附於山中大族和地方豪強，這些分散無備之民，無論如何也抵擋不住強兵悍將組成的有裝備的甲士，¹⁴⁸然而山越與豪強的軍隊也很難說是完全無備的烏合之眾，或許雙方用民兵與正規軍的對比較為恰當。呂春盛研究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指出由於華中地形多山川沼澤，蠻族之族類繁雜，部落林立、組織鬆散，不易擴張，小部落的種族意識難於發展成為全體性的跨部族意識，因而難於發展出有規模而穩固的蠻人政權，無法擺脫被各個擊破因而長期被漢人統治的命運，¹⁴⁹山越的情形應該也是如此。

山越在歷經孫吳政權短短幾十年的征討與統治之後，驟然消失，孫吳滅後，六朝史籍幾乎不再見到有關山越的記載。¹⁵⁰山越

¹⁴⁵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引《吳錄》，頁1105。

¹⁴⁶ 晉·陳壽，《三國志》，卷46，〈吳書·孫策傳〉，頁1104。

¹⁴⁷ 晉·陳壽，《三國志》，卷60，〈吳書·賀齊傳〉，頁1378-1379。

¹⁴⁸ 呂錫生，〈山越在東吳立國中的作用〉，頁32。

¹⁴⁹ 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收入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29-56。

¹⁵⁰ 關於孫吳滅後之山越史料，僅在《陳書》見到陳霸先任命陳蒨為會稽太守討伐山越。唐·姚思廉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3，〈世祖紀〉，頁46。此後隋唐史籍又見數例山越史料，但由於時間或空間相隔久遠，這些史料所載之山越與三國時代之山越是否仍有關連，頗可存疑。參見川本芳昭，〈六朝期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山越・蛮漢融合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

的消失並非被屠殺殆盡，孫吳征討山越的目的是要搜括山越人民以為驅使，自然不可能將山越人民悉數剿滅，因此大部分學者認為山越是融合於漢族之中，只是對融合完成的時期有所爭論。¹⁵¹然而，山越只是當時南方各土著族群居住於山地者的泛稱，而兩晉以後南方山區甚至平地都還是遍布著非漢族的各土著族群，如北齊魏收（507-572）在《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載東晉境內的土著族群：

中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為貉子，若狐貉類云。巴、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蛇魚鼃，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¹⁵²

這裡顯示東晉境內的土著族群仍然極為繁雜，東晉朝廷對這些族群，只能「羈縻而已」，而「未能制服其民」。因此，三國時代的山越可能有部分融合於漢族，但決不可能全部都融合於漢族，山越消失最可能的解釋是，其後裔族稱轉化為上述東晉南朝境內的各土著族群，而默默地生活於江南的土著社會。¹⁵³

（責任編輯：洪慈惠 校對：徐愷謙）

た〉，收入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443-486。（原載於《史學雜誌》，95：8〔東京，1986.8〕，頁35-60。）。呂思勉認為，史籍所見隋唐時代之山越，「未必魏晉屯聚之遺，特史襲舊名名之耳」。參見呂思勉，《讀史札記》，乙帙，〈秦漢·山越〉條，頁582。

¹⁵¹ 相關討論參見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頁17-18。

¹⁵²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96，〈僭晉司馬叡傳〉，頁2093。

¹⁵³ 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頁17-23。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唐·姚思廉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唐·許嵩，《建康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二、近人專書

- 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3。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7。
呂思勉，《讀史札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
張靖龍，《赤壁之戰研究》，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
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黃熾霖，《從中央文官之地域分佈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臺北：天空數位圖書公司，2012。
黃熾霖，《從中央武官之地域分佈及政治派系看孫吳政權的江東化》，臺北：天空數位圖書公司，2015。
魯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
大川富士夫，《六朝江南の豪族社会》，東京：雄山閣，1987。
川勝義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2。中譯本見徐谷芄、李濟滄，《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64。

濱口重國，《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

三、近人論文

尹韻公，〈從荊州爭奪戰看三國前期的外交鬥爭〉，《文史哲》，1981：5，
濟南，1981.5，頁 37-42。

方詩銘，〈「丹陽兵」與「東據吳會」——論丹陽郡在孫策平定江東戰爭中的
地位〉，《史林》，1989：S1，上海，1989.12，頁 16-22。

方詩銘，〈孫堅軍事力量的形成壯大及其爭奪荊豫兩州的戰爭〉，收入《紀
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頁 180-186。

毛漢光，〈三國政權的社會基礎〉，收入毛漢光，《中國中古社會史論》，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 107-138。

王令雲，〈試論孫吳時期淮泗集團的興衰〉，鄭州：鄭州大學碩士論文，
2006。

王永平，〈論孫權父子之「輕脫」〉，收入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6。

王永平，〈張昭政治地位的變遷及其與孫權衝突的原因〉，收入王永平，《孫
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163-169。

王永平，〈孫吳學術文化風尚考論〉，收入王永平，《孫吳政治與文化史
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38-374。

王素、宋少華、羅新，〈長沙走馬樓簡牘整理的新收穫〉，《文物》，1999：
5，北京，1999.5，頁 26-44。

王霜媚，〈孫吳政權的成立與南北勢力的興替〉，《食貨月刊（復刊）》，
10：3，臺北，1980.6，頁 71-81。

田餘慶，〈孫吳建國的道路〉，收入田餘慶，《秦漢魏晉史探微》，北京：中
華書局，2004.2，頁 262-295。原載於《歷史研究》，1992：1，北
京，1992.2，70-89。

朱子彥，〈漢晉之際質任現象綜論〉，《歷史研究》，2015：6，北京，
2015.12，頁 43-60。

何茲全，〈孫吳的兵制〉，《中國史研究》，1984：3，北京，1984.8，頁 93-

106。

何啟民，〈中古南方門第——吳郡朱張顧陸四姓之比較研究〉，收入何啟民，《中古門第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8，頁 79-119。

呂春盛，〈三國時代的山越與六朝的族群現象〉，《臺灣師大歷史學報》，33，臺北，2005.6，頁 3-16。

呂春盛，〈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蠻」及其概念之演變〉，收入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鄭欽仁教授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稻鄉出版社，2006，頁 29-56。

呂錫生，〈山越在東吳立國中的作用〉，《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3，金華，1984.6，頁 63-68。

宋杰，〈漢末三國時期的「質任」制度〉，《北京師院學報》，1984：1，北京，1984.1，頁 4-13。

周兆望，〈孫吳時期江西境內的山越及其對經濟開發的貢獻〉，《爭鳴》，1992：3，南昌，1992，頁 58-63。

施光明，〈山越非山民、宗部解〉，《民族研究》，1984：1，北京，1984.1，頁 66-69。

胡守為，〈山越與宗部〉，收入《學術研究》編輯部編，《史學論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頁 1-17。

唐長孺，〈孫吳建國及漢末江南的宗部與山越〉，收入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55，頁 3-29。

晉文，〈周瑜的家族與家庭〉，《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4：1，南京，2014.1，頁 4-7。

袁剛，〈孫吳鄱陽郡宗民暴動及其性質〉，《文史哲》，1987：4，濟南，1987.5，頁 54-58。

高亞偉，〈孫吳開闢蠻越考（上）〉，《大陸雜誌》，7：7，臺北，1953.10，頁 13-18。

高亞偉，〈孫吳開闢蠻越考（下）〉，《大陸雜誌》，7：8，臺北，1953.10，頁 12-18。

高敏，〈試論孫吳建國過程中北方地主集團與江東地主集團之間的矛盾鬥爭〉，《鄭州大學學報》，1994：1，鄭州，1994.2，頁 22-27。

- 高敏，〈孫吳世襲領兵制度探討〉，收入高敏，《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鄭州：大象出版社，1998，頁 68-95。
- 張大可，〈略論三國形成時期的外交〉，《學術月刊》，1987：9，上海，1987.9，頁 65-70。
- 張曉東，〈孫吳政權創建時期的孫氏族人〉，《湖北社會科學》，2007：12，武漢，2007.12，頁 112-114。
- 許倬雲，〈三國吳地的地方勢力〉，收入許倬雲，《求古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561-585。原載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 上，臺北，1967.3，頁 185-200。
- 陶元珍，〈三國吳兵考〉，《燕京學報》，13，北京，1933.6，頁 49-87。
- 傅樂成，〈孫吳與山越之開發〉，收入傅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頁 81-91。原載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3，臺北，1951.12，頁 119-128。
- 湯奇學，〈周瑜研究兩題〉，《安徽史學》，2014：4，合肥，2014.7，頁 157-160。
- 趙昆生，〈孫吳世襲領兵制研究〉，《重慶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4，重慶，2003.12，頁 18-22。
- 趙國華，〈三國時期的吳蜀關係〉，收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古代史論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215-228。
- 趙國華，〈三國時期的魏吳關係〉，收入華中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編，《中國古代史論集》，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229-243。
- 劉淑芬，〈六朝會稽士族〉，收入劉淑芬，《六朝的域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 255-315。
- 潘民中，〈曹魏對蜀吳夷陵之戰取觀望態度原因初探〉，《許昌師專學報》，1990：4，許昌，1990.12，頁 52-57。
- 魯西奇，〈釋「蠻」〉，收入魯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會：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2，頁 23-56。
- 謝偉傑，〈孫吳「彈性外交」述論〉，《漢學研究》，22：1，臺北，

2004.6，頁 21-45。

魏斌，〈孫吳年號與符瑞問題〉，《漢學研究》，27：1，臺北，2009.3，頁 31-55。

羅新，〈走馬樓吳簡中的建安紀年簡問題〉，《文物》，2002：10，北京，2002.10，頁 92-95。

羅新，〈王化與山險——中古早期南方諸蠻歷史命運之概觀〉，《歷史研究》，2009：2，北京，2009.4，頁 4-20。

關尾史郎，〈曹魏政權與山越〉，《文史哲》，1993：4，濟南，1993.4，頁 30-33。

顧江龍，〈孫吳建國歷程新探〉，北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

川本芳昭，〈六朝期における蛮の理解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山越・蛮漢融合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見た〉，收入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 443-486。原載於《史学雑誌》，95：8，東京，1986.8，頁 35-60。

井上晃，〈三國時代の山越に就て〉，《史観》，17，東京，1938.10，頁 57-68。

石井仁，〈孫吳政權の成立をめぐつる諸問題〉，《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6，仙台，1995.1，頁 70-94。

柳瀨喜代志，〈吳王朝受命譚考〉，《中国詩文論叢》，13，東京，1994.10，頁 29-31。

渡邊義浩，〈孫吳政權の形成〉，《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38，東京，1999.3，頁 81-115。後收入渡邊義浩，《三國政權の構造と「名士」》，東京：汲古書院，2004，第三章第一節，頁 217-248。

渡邊義浩，〈孫吳の正統性と國山碑〉，《三国志研究》，2，東京，2007.7，頁 40-65。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Formation of Sun-Wu Regime

Leu, Chuen-sheng^{*}

Abstract

The Wu State (222-280), also known as the Sun-Wu regime, was founded by Sun Quan (182-252), after his father Sun Jian (155-191) and his brother Sun Ce (175-200) had helped to lay its foundations. The regime is historically significant not onl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of the Six Dynasties (222-589), but also because it contributed to the formatio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420-589).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Sun-Wu regime has focused mainly on its more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ynastic power struggles. By contrast,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critical role by minor ethnic groups located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the regime.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ethnic groups, known collectively as the Shanyue, helped to shape to formation of the Sun-Wu regime. It also looks at how the rulers of the Sun-Wu regime played the Shanyue and the Huai Si Group against one another as a way of consolidating their hold on power.

Keywords: Sun-Wu Regime, Huai Si Group, Jiangdong Clans, Shanyue, Ethnic Relationship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